名与身孰亲？ ——从“贱名贵生”观解读阮籍《首阳山赋》

束莉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中国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在儒家语境中, 伯夷、叔齐被作为正统君臣观念的维护者而受到褒扬, 但珍视个体生存, 轻视世俗声名。主张“贱名贵生”的道家则敏锐地感触到了其中潜存着的“名”与“生”之冲突, 认为夷齐让国采薇、穷饿而死是求名害生的不智之举。汉晋之际, 随着老庄思想的流播、现实政局的簸荡及门第观念的勃兴, “贱名贵生”观渐渍人心, 士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逐渐沿循了道家的思路。《首阳山赋》即是服膺老庄的阮籍援用“贱名贵生”观, 对“首阳”话题进行的一次不拘限于传统儒家观念的重新演述。它有效地破解了阮籍在齐王曹芳被废事件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 并促使他作出了顺适时局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阮籍后期的命运升沉, 也联动了陈留阮氏家族的族运转机。

关键词: 阮籍; 《首阳山赋》; “贱名贵生”; “首阳”话题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186-06

阮籍《首阳山赋》作于正元元年(254年)秋, 时当魏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的前夕。山雨欲来之时, 就“首阳”这个敏感话题撰写专文, 必然含有对时势的微妙考量。因而作为反映他彼时心境的珍贵文献, 此赋被学者们反复研读, 并取得了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成果。^①但文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是: 伯夷、叔齐历来被看作维护正统君臣道义者的象征, 阮籍却对他们提出了尖锐的质问和批评, 认为他们隐居首阳, 不食周粟而死的行是“肆寿夭而弗豫兮, 何美论之足慕”。以往的解读或认为阮籍以夷齐自比, 神往隐逸; 或认为阮籍曲用典故, 假托夷齐被周武王挟制来言说自己也因处司马氏身边, 不得已对目前的种种不义保持沉默, 已经不期望得到后世的“美论”了。笔者认为, 这些解读尚欠圆通。实际上, 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有着多元的阐释空间, 当被分别放置在儒道这两个相异的背景中时, 也会相应呈现出不同的言说模式。在儒家忠君观念的主导性定于一尊的时代, 伯夷、叔齐往往作为道德楷模而受到尊崇和褒扬; 而当老庄那消弭一切现实利益、更多关注个体生存状况的价值体系成为时尚时, 采薇穷饿的意义则不免遭遇质疑。随着魏晋时期老庄思想的流布以及门第观念的勃兴, 士人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呈现多元化的样态。既然阮籍受到思想史的关注多半可以归因于他那带有鲜明老庄风格的行

迹, 那么在对他的事迹乃至诗文进行解读时, 就应该充分考虑各种思想资源给予他的综合影响, 而非单一地取径儒家。如果我们注意到魏晋时期, 道家“贱名贵生”的价值取向正逐渐被士人认同并实际影响着他们的立身处世, 再联系阮籍身处的实境, 或许有可能更为贴切地理解此赋写作的动机与思路。

一、汉晋之际的“贱名贵生”观与“首阳”话题的衍变

(一) “贱名贵生”观的滥觞与被认同

尽管同样强调对物质利益的淡泊, 但儒道两家对名与身的关系却有着不同的界说。儒家始终保留了对名节的珍视, 并将其视为领袖人伦的资本, 激励世人倾力追求, 虽殒身殉名亦在所不惜; 道家却更为彻底地体悟到了个体生存的可贵与所谓名节的虚幻, 老子即提出了一个直逼终极价值的发问: “名与身孰亲?”^{[1](179)}并认为, 只有身存, 才谈得上存天下: “故贵身于天下, 若可托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者, 若可寄天下。”^{[1](50)}稍后的庄子更是把个体的生命价值置之一切外在价值之上: “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身, 又况他物乎!”^{[2](965)}

收稿日期: 2011-05-18

作者简介: 束莉(1982-), 女, 安徽合肥人, 南京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先唐文学。

两汉时期，士人多习儒学，他们砥砺名行，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令名，天下向风，延及妇孺。东汉党锢名士范滂临刑时，其母慰勉他：“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3](2201)}但人非草木，当仕途的困顿、身心的折辱以及末世的苍凉感连番来袭，士人们也免不了对声名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后汉书·马融传》载：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鹭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贵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鹭召。^{[3](1953)}

如果说马融的选择在东汉士人中还颇显“另类”的话，两次党锢事件之后，士人的锐气遭到了无情的摧折，随后汉室播迁，生灵涂炭，士人自顾不暇，济世安国之志逐渐蜕变为保身全家之念。党锢之祸前不久，颍川荀爽致书李膺，“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匪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沈，与时抑扬。’”^{[3](2195-2196)}魏移汉鼎，大臣们纷纷选择了沉默乃至支持，这种集体“失语”的背后是怎样一种观念的改变呢？那就是对“生”（身）与“名”关系的更富于现实性思考^②。“生”意味着个体生存的保障与身心的安逸，而“名”则要求士人在个人的身心逸豫与儒家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抑制自己的欲望，遵循道德规范。然而，两汉察举、征辟等过于崇尚道德楷模的仕进制度已经引发了太多的虚矫激诡之行，士人对“名”业已满怀倦怠和怀疑；此外，东汉以来，士族勃兴，“生”已从一己安危扩展到整个宗族的存亡祸福，面对篡乱交替，一如既往地恪守传统君臣道义确有以卵击石之嫌。此时，道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既然“生贵于天下”，那么无论是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还是崇高的名声，任何损生害性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沿循此一思路，对“首阳”话题的言说自然也就具有了有异于儒家的方式。

（二）“首阳”话题的阐释空间和言说模式

《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对“首阳”话题的本事有详细的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

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4](2122-2123)}

平心而论，二老劝谏武王的两个理由都略显迂执，但他们的行为至少三个方面得到了儒家的褒赞。首先是慨然让国。二人因此被称为具有廉德的“圣之清者”。^{[5](672)}其次是“不念旧恶”。^{[6](129)}而最为处于乱世的儒者所称道并着意效仿的，则是二人所坚守的“非其君不事”的臣道，“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5](669)}《论语·述而》篇记载：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为也。”^{[6](161-162)}

可见，对伯夷、叔齐的尊崇，本身就包含了与对出处进退的现实思考。

庄子对夷齐的评价则与孔孟明显不同：“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之其间哉！”^{[2](323)}“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2](998)}庄子敏锐地感触到了“首阳”本事中潜存着的“生”与“名”的矛盾，并对“生”抱有一种顾惜的态度，对于“残生伤性”的求名之举则不以为然。考虑到战国诸侯交争、篡弑满目的背景，庄子对夷齐的再评价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传统君臣道义的一种颠覆：与个体生存相比，包括名节在内的一切俗世价值都不过是一种外在而虚幻的执障，不值得以个体的消殒为代价去换取。

西汉大一统的王权建构完成后，儒学主导了各种公开层面的言论，但在属于私生活的场合与文体中，各种蛰伏的思想却也不时流露。如一生致力于儒学意识形态建构的董仲舒，却在骚体赋这种多用来抒发愁穷牢骚的文体中，同病相怜地慨叹起夷齐二人的不得志：“观上世之清晖兮，廉士亦葳葳而靡靡。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下（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举世而同迷。”^{[7](228)}因仕路受挫而将夷齐引为同调的思路甚至导源出以二人为戒的论调。再如，如东方朔在其不乏用世之心的《非有先生论》中，称赞夷

齐的高节：“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8](2810)}而在《诫子》中却“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明者处世，莫尚於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9](418)}

汉魏之际，由于历史情境的可比附性，“首阳”话题的现实象征意味再度凸显。曹操力克群雄的赫赫武功以及他的易代野心都使得他隐隐以殷周之际来比附当下的形势。但随着他的不臣之心日渐昭著，一些狷介的士人也以高蹈的姿态来传达无声的异议，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举动便被赋予了拒绝与篡乱的当权者合作的意味，这正是多疑雄猜的曹操所忌讳的。在为不接受他的封爵的田畴而下的诏书中，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伯夷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10}这无疑为日后他的僚属们对“首阳”话题的集中讨论定下了基调。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率部征马超，途经首阳山，阮籍之父阮瑀以及同行的王粲、糜元等同吊夷齐。恪守传统道义、不乐争竞的阮瑀对伯夷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和尊重：“重德轻身，隐景潜晖。……没而不朽，身沉名飞。”^{[11](475)}但“燥锐”的王粲在《吊夷齐文》中却对伯夷、叔齐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知养老之可归，忘除暴之为世”。^{[11](388)}糜元《吊夷齐文》对二人的批评更为激切：“子不弃殷而饿死，何独背周而深藏？是识春香之为馥，而不知秋兰之亦芳也。……诵周之文，听圣之音，居圣之世，而异圣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9](663)}直指夷齐为不识时务、不分是非之人。同为曹操的僚属，对于首阳话题的不同阐释却也表露出了他们对时局态度的微妙差异。

汉魏易代完成以后，以对夷齐的褒贬为自身对易代态度表述的现实意义一度隐退，但门第的壮大也让士人更多地沉溺于明哲保家的思虑中。现代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与门第兴起互为表面的，是魏晋南北朝“家诫”一体的流行。在这种向子孙后代传授保家全身之法的私人化文体中，很多士人谆谆告诫子孙应以伯夷、叔齐的激诡之行为戒。《晋书·阮籍传》提到，阮籍叔父阮武曾携少年时的阮籍去拜见袁州刺史王昶。这位后来官至司空、名重当世的王昶在他那篇流传颇广的《家诫》中，也谈到了当以夷齐为戒，不必过分追求名节：“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⑧王昶的后代即魏晋驰名的太原王氏，应该说在篡乱相继的魏晋南北朝，王氏家族的绵久繁盛与王昶所树立的这种贱名贵“家”的观念是分不开的。同样，魏晋之际的其他名门盛族，也和太原王氏一样，日益疏离了传统的激贪励俗、扬名立节的观念，

着意经营家族的世代冠冕，最终开启了魏晋南北朝君主颠危于上，臣子默然于下的独特政治景观。^{[12](61-65)}

二、阮籍《首阳山赋》中的“贱名贵生”思路

阮籍《首阳山赋》落笔便渲染出了一派深秋凄恻的景象。“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风翔过而不集兮，鸣泉群而并栖。”对景物的铺写往往泄露出作者当下的微妙心境，凄风苦雨、荒凉贫瘠、鸣泉群集的首阳山，正是阮籍彷徨疑虑的内心投影。上文已述，此赋写作恰值魏帝曹芳被废前夕，对于任何一个受过儒家正统君臣观念陶染的士人来说，废立之事都是对自己政治信仰、道德底线的莫大挑战。阮籍无疑也深深陷入道德困境，历史上曾经几经讨论的“首阳”话题又在他的心间被唤醒，对伯夷、叔齐的追思与再评价实际上就是他对自我的立场、出处进行郑重选择的契机。

伯夷叔齐的正面评价，为此赋的重心所在，也正是各家异议迭出之处。“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④代表着吉祥安乐的风鸟远离了这片冷寂的土地，而伯夷叔齐则以迟暮之年无奈地归隐于此。“实囚軋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此处行文明显流露出对伯夷、叔齐的怀疑：二老困居此处实同囚囚，毫无暇豫可言，如何还敢去非议当政？他们摒弃佳肴不食，自甘采薇穷饿。与其父阮瑀《吊伯夷文》那热情洋溢的赞颂不同，阮籍的笔调出人意料之冷静，这是因为，他对二老的行为有着不同于其父的评议。

阮籍在此赋中评价了夷齐的两个事迹，一是投奔周文王。“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殷”指纣，而“昌”即指周文王。阮籍认可了他的父辈王粲的看法，认为他们抛弃了危败的殷纣而归附周文王，是一个明智之举。

对于另一项事迹，即二老谏周武王伐纣，阮籍的评价是：“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此”指的即是夷齐谏武王而不被接纳。阮籍认为，这是因进谏不成而产生的君臣不合。进谏不成即退居穷处，是不能称之为“仁义”的，更何况这种“仁义”还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了损害。这便是承继了老庄原有的思路。《庄子·骈拇》即认为仁义是害性损生的：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2](323)}

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
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
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2](327)}

“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
兮，何美论之足慕。”阮籍进而认为，伯夷叔齐固执己
见以求“美誉”，从而失去了颐养天年的机会，困居首
阳，毫无逸豫可言，即使拥有了美誉，也没有什么可
羡慕的。在赋的结尾，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苟道求
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
而言之。”在对夷齐的事迹进行一番仔细思量之后，阮
籍发现，“若一深究其中之理，又何必夸大其辞；宁清
虚以守神，此并非激愤之言也。”^{[13](28)}可见，经过一
番重新考量，他已经不愿过分表彰伯夷、叔齐的道德
楷模作用，也不愿再慷慨激昂地陈说大道理，而意在
清虚守神，从容养性。

阮籍对“首阳”话题的评述并不始于《首阳山赋》，
早在正始年间的《达庄论》中，他的观点就很明晰：
“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
而死，颜夷之穷也。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
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13](146)}《达庄论》是
阮籍的早期庄学论著，基本上是对庄子思想的整合、
贯通，其中对夷齐的评价也并不是惊世骇俗的创见，
而只是沿袭了《庄子》的固有思路。“贱名贵身”观也
贯串在《大人先生传》的文脉中。值得一提的是，这
篇文章历来引起论者关注的多在于阮籍对礼法之士的
批评。实际上，阮籍笔下受到大人先生批评的对象有
三种：礼法之士、隐士、薪者。“抗志显高，遂终于斯，
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的隐士和
伯夷、叔齐的行迹相仿，而阮籍假托的大人先生也
对其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处世态度不免偏狭：“恶彼而
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
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
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迫死。”^{[13](173)}阮籍
认为，如果像隐士那样和禽兽草木同处，枯槁而死，
即使获得荣名，又有什么意义？

可见，在《首阳山赋》中，阮籍承继了庄学中“贱
名贵生”的价值判断思路，对伯夷、叔齐作出了不同于
儒家传统君臣观念的评价。既然“首阳”话题从孔子开
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命题，而是与对现实政治的
思考联系在一起，那么阮籍在历史的节点上进行的这
番思索是不是也与他的政治选择密切相关呢？笔者认
为，在此赋中，阮籍明确了自己将秉持的处世思路
——抛弃传统儒家因拘守名节而不惜害生殉名的做
法，心游玄虚，顺应时局。这可由他在此后不久的政

治境遇来证明。

三、《首阳山赋》写作前后阮籍的政治境遇

阮籍正式步入仕途是从嘉平元年(249年)进入司
马懿太傅府任从事中郎开始的。嘉平三年(251年)司
马懿去世后，阮籍转任司马师的大将军从事中郎。到
《首阳山赋》写作前，他已经在司马氏的幕府中任从
事中郎近6年了。

从事中郎一职在司马氏的幕府中居于何等地位
呢？通行的观点认为，阮籍在司马氏府中任职闲散，
仕禄而已。但如果详细考察司马氏幕府中官属的设置
和职能，可能会得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结论。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父子政出己门，逐步完善
自己的公府职能，谋求架空并取代曹魏朝廷的统治职
能。因此他们的公府，被史家定性为“霸府”^⑧。《晋
书·宣帝纪》记载：“(嘉平)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
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16](19)}
尽管实际上可能存在超员，但作为司马氏家族霸府初
级形态的司马懿太傅府的人员配额还是相当紧张，而
从事中郎又属要职。卢弼《三国志集解·阮籍传》“从
事中郎”条云：“太傅及大将军皆有从事中郎，太傅从
事中郎二人，千石，第六品，职参谋议。”^{[14](517)}据张
军考论，现在可知的曾任司马懿太傅从事中郎的有王
观、傅嘏和卢钦，他们都深受司马懿倚重。^[15]司马懿
去世后，司马师迁大将军，总揽军政大权，阮籍也随
之转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司马师崇尚实务，笃于事功。
他曾明确阐述过自己的用人标准，那是在他早年任中
护军时，欲辟任石苞为司马，“宣帝(司马懿)闻苞好色
薄行，以让景帝(司马师)。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
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16](1001)}
据陶贤都考论，与阮籍同样出任过司马师府从事中郎
的还有李熹、武陔^{[17](94-95)}。咸熙二年(265年)，李熹
以太尉兼司隶校尉与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奉皇帝玺绶策
书，魏禅位于晋；武陔累迁司隶校尉，与李熹同为晋
开国重臣。^{[16](1284)}可见，从事中郎确是司马氏霸府中
可委以重任的腹心之职，阮籍长期担任此职，不可能
只是尸位素餐，必定具有一定的“经国才略”。现存史
籍瞩目于阮籍富有戏剧性的名士言行，却对他的其他
面相付之阙如，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晋书·阮籍传》载：“高贵乡公即位，赐(阮籍)
爵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在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的当口,阮籍如此加官进爵,是谬赏还是实功?^⑥

杨光辉总结出汉唐封爵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无功不封”^{[18](125-139)},大量史实可以印证,它确实是魏晋时人的一种通识。《三国志·苏则传》载,时任金城太守的苏则抚循边陲有功,曹丕欲封其为关内侯,在此之前,发密诏于大臣张既:“试守金城太守苏则,既有绥民平夷之功,闻又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势,吾甚嘉之。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问卿。”^{[19](491)}这种对封爵的郑重也延续到了处于司马氏操纵下的曹魏后期,《晋书·鲁芝传》载:“诸葛诞以寿春叛,(晋)文帝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鲁)芝率荆州文武以为先驱。诞平,进爵武进亭侯。”^{[16](2329)}

另外,《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云:“正元元年冬十月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步、班赐各有差。”可见,高贵乡公方一即位就实施的这次封赏是为奖励废立定策有功之臣而行的。查检史料,与阮籍同时受封关内侯的有两个人,一是王祥:“高贵乡公即位,与定策功,封关内侯。”^{[16](988)}再者是钟会,“高贵乡公即尊位,赐爵关内侯。”^{[19](784)}此二人都拥护司马氏,并在此次废立中有谋划之功。如果阮籍毫无贡献而与二人同样进爵关内侯,那么和司马师“举不越功”^{[16](25)}的原则可谓是大相径庭。至于司马氏“拉拢”阮籍一说,则不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彼时司马氏代表了曹魏时期世家大族的共同利益,身边集结了众多的一流世族成员,^⑦而陈留阮氏彼时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性士族,父祖仕宦不过二千石^⑧,阮籍更是年幼失怙,其任诞行为还招致了当朝礼法之士的反感,而这些礼法之士,往往多是执掌重权之臣。阮籍得以与王祥、钟会一同受爵,不可能没有让众人信服的理由。

封爵以外,阮籍得到的另一项殊荣是转任散骑常侍。从司马氏府中的僚属一跃而为帝王近侍,位望清华,入则陪侍君王,出则典州郡。此时,与阮籍同为高贵乡公近侍的有散骑常侍裴秀、中护军司马望、黄门侍郎钟会均为一时望族子弟,^⑨在政治上也都倾向于司马氏。阮籍厕身其中,也颇意味深长。

一位与阮籍“交游契合”的友人在其执笔的碑文中,追述阮籍的处世风格:“或出或处,与时升降;或默或语,与世推移。……不屑夷齐之洁,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连之污,故其道不可屈也。”^⑩尽管历史往往有着令人遗憾的留白,但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上述考察判断出阮籍对时局采取的正是与世推移,从容顺应的态度,而这不仅给他自身带来了庇护、安逸和高

官显职,^⑪也给陈留阮氏家族带来了族运的上扬。毛汉光以三国时期为魏晋南北朝士族发展的“上坡面”,并指出,陈留阮氏勃兴于从三国,至两晋南朝发展为大族,跻身于陈郡谢氏、泰山羊氏之列^{[20](58-59)}。考诸史实,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阮籍之子阮浑,从子阮修,族弟阮放、阮裕,兄子阮咸二子阮瞻、阮孚在两晋时期均出任要职,深受时流推重^{[16](《阮籍传》附)}。西晋“上品无寒门”的升迁潜规则业已趋于常规化,阮籍的后人在两晋仕途畅达,不仅缘于“竹林七贤”声望的上扬,也与司马氏对阮籍的眷顾、照拂不无关系。^⑫

正如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给魏晋玄学留下了广阔的阐发余地,儒家先哲对伯夷、叔齐冠以“贤人”^⑬这一略带保留的尊称也使得魏晋士人有契机接受老庄“贱名贵生”的思路,从尊崇夷齐渐变为批评二人殉名害生。这一言论的转向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士人们不再拘守传统的儒家君臣观念,转而个人、为家族计,这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勃兴的思想背景的构成因素之一。以往对阮籍《首阳山赋》的解读,忽视了“首阳”话题在儒道两种语境中的不同阐述路向,认为只要是谈到“首阳”就必然表达了对传统忠君观念的追慕。事实上,作为深受老庄之学浸润的魏晋名士,阮籍也同样接受了“贱名贵生”的思路,在《首阳山赋》中对伯夷、叔齐作出了不同于儒家的评价,并随之作出了追随时流的政治选择。这个选择不仅有益于他个人政治境遇的改善,也促成了陈留阮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跻身于大族之列。

注释:

- ① 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如:王利锁:《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② 在道家著作中,与“名”相对应的“生”和“身”往往是通用的,因为个体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心的安逸。
- ③ 阮籍在人生态度上应受到王昶的一定影响。因为王昶是除阮武之外,早年对阮籍作出较高评价的一位长者,见《晋书·阮籍传》。王昶为人谦退谨慎,《三国志·王昶传》:“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其子浑字玄冲。”而阮籍也为其子取名浑,字处长。考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慎取名字的习惯,这种格调相似的命名也有可能是出自对王昶处世态度的一种追慕。
- ④ 本节对《首阳山赋》文句的释读,多参考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不一一出注。
- ⑤ 陶贤都在《魏晋南北朝霸府和霸府政治研究》一书对霸府的

功能有着明晰的定义：“霸府，也叫霸朝，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署机构。”

- ⑥ 不少学者认为，此次封赏是司马氏为拉拢阮籍刻意所为。如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首阳山赋〉发微》，高晨阳：《阮籍评传》等。
- ⑦ 参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等等。
- ⑧ 参王建国：《魏晋陈留阮籍及其家学家风考论》，《天中学刊》，2004.4。
- ⑨ 《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帝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讲宴于东堂，并属文论。名秀为儒林文人，沈为文籍先生，望、会亦各有名号。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卒五人，每有集会，望辄奔驰而至。”《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
- ⑩ 参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附录《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碑》，后有张燮注：“碑之言曰‘临濠濮而存惠子之问，运斧鑿而思郢人之斤’，则又似交游契合者，不宜出后人手。”
- ⑪ 阮籍后官至步兵校尉，《通典·职官十六》载五校尉为武散官之列，自汉以来：“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必给，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张金龙认为：“阮籍曾为太傅司马懿、大司马司马师、大将军司马昭之从事中郎，自属司马氏亲信。”参《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129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 ⑫ 检视《世说新语》，司马氏特别是司马昭优容善待阮籍的记载不在少数。
- ⑬ 见第一章第二小节引用孔子语，这一说法也为孟子等儒家学者继承。而在儒家的尊称序列里，“贤人”是稍逊于“圣人”的。

参考文献：

- [1] 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3]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5] 焦循. 孟子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7] 严可均. 全汉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8]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9]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 [10] 严可均. 全三国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1] 吴云. 建安七子集校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 [12] 郝虹.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J].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3): 61-65.
- [13] 陈伯君. 阮籍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4] 卢弼. 三国志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5] 张军. 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42-47.
- [16]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陶贤都. 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 [18] 杨光辉. 汉唐封爵制度[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19]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0] 毛汉光.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Which is closer, fame or body? ——on Ruan Ji's *Shouyangshan Fu* via the concept “Life is more precious than fame”

SHU Li

(School of Literal Ar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opic of “Shou Ya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has a multi-space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fucian context, Bo Yi, Shu Qi had been praised as the defenders of the orthodox concept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while the Taoist,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despised worldly fame, advocating “Life is more precious than fame”. They believed that the behavior of Bo Yi and Shu Qi was unwise.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during the stream of Taoism, the unrest of social and the rise of Door No. concept, the concept “Life is more precious than fame” gradually stained the people, the evaluation of Bo yi, Shu Qi was also gradually closer to Taoism. “Shouyangshan Fu” was a reformulate of the topic of “Shou Yang”, which was unlimited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s. It effectively cracked the ethical dilemmas, which Ruan Ji encountered in the event Cao Fang had been repealed, and led him to make a timely political choice. This choice not only determined the fate of him, and also decided the fate of the prospect of Ruan’s family.

Key Words: Ruan Ji; *Shouyangshan Fu*; “Life is more precious than fame”; the topic of “Shou Yang”

[编辑：苏慧]